

甘棠遗爱，甬城永祀—— 宁波城隍庙里的四位陪祀神



周东旭

今年是宁波建城1200年，关于这宁波建城，一是“明州城”的概念，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(738年)，设明州，唐长庆元年刺史韩察迁州治于三江口，建子城；二是城池的概念，古代的城市和现代的区别是，古代的城市一般指城墙以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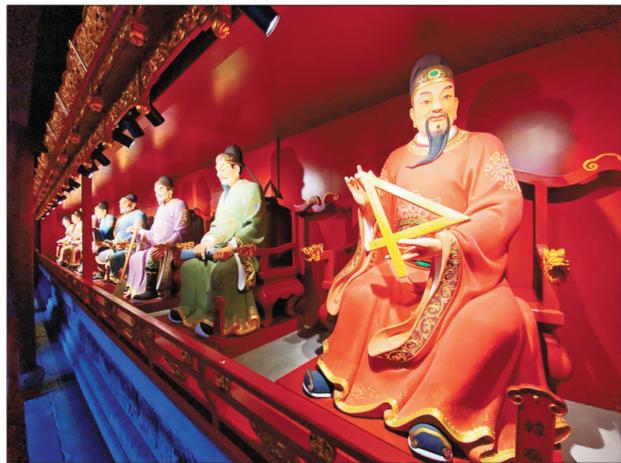
至于城池，则有相关的礼制概念，比如都有城市中轴线，有子城、罗城、城门、护城河。《周礼》记载：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。国中九经九纬，经涂九轨，左祖右社，面朝后市，市朝一夫。”这是礼制对建城影响深远的一段话。

古代城市里也有许多“标配”建筑，比如孔庙学校、衙署、城隍庙、社庙、寺庙、官观等。明代开始，城隍庙也成为一个城市的标配。

城隍，“城”指城墙，“隍”指护城河，城隍本来是指守护城池之神，后来慢慢从自然神演化至人格神，成为护卫地方、保境安民、剪除凶恶的冥官。而且，凡有城池的地方均设有城隍庙，所以如今宁波，除了宁波府城隍庙，还有鄞县城隍庙，原来在大梁街，后改为大梁街小学，而今还有八块碑刻在天之海大厦。

象山石浦的城隍庙，现在也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，建筑气势恢宏。为什么石浦也会有城隍庙呢？因为明代的时候设置卫所，凡卫城、所城均有城隍庙。历史上，一些忠肝义胆的人，常常被供奉在城隍庙，成为城隍神，如北京的城隍庙里有文天祥，河南开封的城隍庙里则是包拯。我们宁波府的城隍神，叫纪信。有一出《取襄阳》的京戏，讲的就是纪信为救汉王刘邦，李代桃僵，最后被项羽烧死。刘邦得了天下，就封纪信为城隍之神，享受百姓朝拜。

宁波的城隍庙，去年修缮后重新开放，从古建筑修复，到传统工艺的保留和融入，还增添了几尊神像。



▲城隍庙内纪念地方官的怀棠祠。怀是怀念的意思，棠则出自《诗经·召南·甘棠》：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。”



▲鄞县城隍庙的八块碑刻，如今在大梁街的天之海大厦内。(摄影 朱晨凯)

据在城隍庙工作了20年的地方文化爱好者林宇镇先生回忆，原来城隍神边上有八大陪祀神，分别为韩察、应彪、王元暉、黄晟、沈承业、王安石、张琪、钱肃乐。城隍庙维修后，一并塑在怀棠祠里。

从八个人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宁波历史。这八位陪祀，除了钱肃乐不是地方官外，其他人都是明州或鄞县、鄞县的一把手。明末，钱肃乐与张苍水在城隍庙聚义起兵。沈承业是五代时首建城隍庙的郡守，张琪则是明初迁建城隍庙的郡守。王安石治鄞三年一千天，影响宁波千年，在城隍庙享受一份冷猪肉头肉，也是理所应当。

现今说说唐代的四位。韩察是唐代长庆元年迁建子城的刺史，应彪是修建灵桥的刺史，王元暉是修它山堰引水入城的鄞县令，黄晟是修罗城的刺史。

韩察，京兆长安(今陕西西安)人，韩休曾孙，唐元和十一年(816年)为河东节度判官、侍御史，后任

京兆府富平县令、明州刺史等职。《全唐诗》存诗一首，“韩刺史察，京兆人。长庆元年(821年)刺史，易县治为州治，撤旧城更筑新城。功大而民不知役。韩材材为文记之。”《嘉靖志》里，用了“功大而民不知役”七个字，评价这位太守。

有一个朋友和我说，821年是牛年，韩休之子韩滉，是《五牛图》的作者，不妨做点建城“牛”文章。我想也是十分有创意。

清代诗人李邕的《鄞东竹枝词》诗云：“东津桥板跨江浮，一字平盛十六舟。千载人驱车马过，可知遗泽是应彪。”灵桥修建于长庆三年(823年)。应彪原应写作殷彪，《宝庆四明志》卷一《郡守》记载：“应彪，长庆三年刺史，建浮桥，跨江五十五丈。”因避宋太祖赵匡胤父亲弘殷讳而改为应彪。

还有一篇殷彪的墓志铭，虽有缺字，大概能读出他的简单生平，殷

彪，字文穆，他的先人是陈郡人。长庆初年，授官金州刺史兼侍御史，又调任明州刺史。在任上，有不少政绩，最后死于明州任上，葬葬从俭。

唐太和七年(833年)，王元暉做了鄞县令，首要任务便是修筑樟溪水利工程。当时的设想是这样的，在樟溪入鄞江的山口建筑一道拦水坝，挖一条新的引水渠把淡水引入南塘河再入日月双湖，使得平时的樟溪水三分入江，七分入河，等到洪水期到来时，则七分入江，三分入河。

说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在哪儿选址，如何筑堰，水利学家们会抽丝剥茧进行分析，各种巧妙之处，只能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了。民间流传着许多“十兄弟”“打血桩”等传说，想来这一千多年前的筑堰工程，是异常艰难的。

《四明续志》中说：“唐太和七年邑令王侯元暉相地之宜，以此水道襟喉之地，规而作堰，截断潮汐，导大溪之流，自堰之上，北入于溪百余丈，折而东之，经新安、许家，会普宁寺前小溪唐家堰新堰面此前港也。自普宁寺东分流，北入惠明桥经仲夏此后港也。”

它山堰的边上就是它山造德庙，庙的大殿中供奉的就是王县令，两边是“十兄弟”，有胖的，有瘦的，有高的，也有矮的，有和尚，也有工匠。这或是雕神像的工匠的巧思，也可能是一种图腾式的雕塑，一如八仙组合，男女老少，富贵贫贱，包含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员。

四

黄晟，字明远，鄞县人，身材矮小，一次去投军的时候，没被录取，后来被刺史羊侃看上，任为骑将。唐末是个乱世，黄晟以战功授散骑常侍、浙东道东面副指挥使。景福元年(892年)，成为明州刺史，保境安民，广招文士。江东文士多来归，黄晟筑宅安置，称“措大营”(今在君子街)。

明州早年民苦野居，乾宁五年(898年)，黄晟率民采石筑罗城，保一州生聚之安，周长18里，又重建奉化江东浮桥。他在任18年，为官廉正，后封江夏县开国子。临终上疏，勿让子嗣荫，府库所蓄，皆题“送使”字样。

这四位唐代的方官，若论功劳人品，确实值得在城隍老爷边上，分一脉香火。

有一种“雀跃的安全感”

世象管见

吴启钱

笔者在鄞州书城三楼吧台前等咖啡，顺手翻开一本读者留言簿，有一则留言让笔者眼前一亮：“真的好喜欢书店啊！给我一种雀跃的安全感。让我清晰地感知到，这就是属于我的地方。老了以后一定要开家书店。”

《中国青年报》有一个调查显示，当下有70.9%的年轻人出现了语言匮乏。比如，不管什么搞笑的事情，都只用“哈哈”来表达；不管对什么令人佩服的事情，都只用“牛掰”来表达；实在无从表达，就选个“表情包”救急。

这么看来，鄞州书城留言簿上的这位读者，他(她)的“雀跃的安全感”，并不是一般人能感受到，也不是一般人能表达出来的。

安全是人最基本的需要，安全感本身也分等级。

衣食无忧是第一个等级。一个人，如果有“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”的物质条件，就可以“一日清闲一日仙”。对社会而言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生产力的进步，是保证人类安全的基础；对个人而言，通过劳动来获得物质，是多数人获得安全感的保证。旧时代的妇女，因为在物质上完全依赖男人，家庭生活中时时有不安全感。所以，钱钟书在《围城》中说“丈夫是女人的职业，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”。

环境无害是第二个等级。我们常说的“平安”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。比如，食品、空气和水是不是卫生干净，房子是不是牢固、能不能保护隐私，走在路上会不会被车撞，或被高空抛物砸中，买东西会不会被坑……环境若无害，舒展又安心。环境无害的是文明与规则。商业有文明，商家会提供安全合格的产品和服务；居家有文明，家庭内外都能顾及邻居的感受；出行讲文明，车遵章，人守法，互谦让；执法有文明，不怯

强而凌弱……一个文明的社会，必然是一个环境无害的安全社会。内心无虞是最高等级，也正是“雀跃的安全感”。

春日的郊外，孔子和弟子们围坐在地上，孔子问弟子们的志向。曾皙说，我的志向是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孔子听完，长叹一声说：我和曾皙的想法一样啊！确实，春风十里，好友相伴，野外高歌，闲适自在，无忧无虑，这就是“雀跃的安全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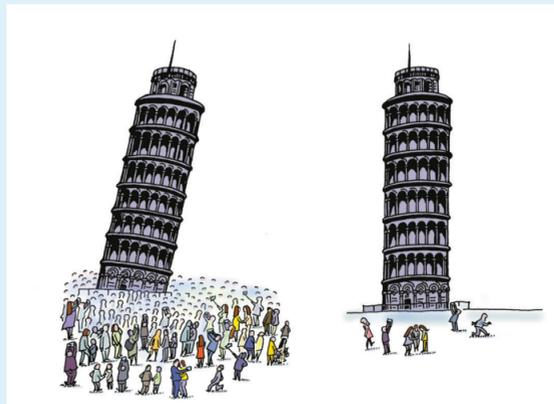
张爱玲也描述过这种表面上可能波澜不惊、内心里却欢呼雀跃的安全感：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恰巧赶上了，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惟有轻轻地问一声：“噢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”在对的时间地点遇到对的人，也只有“雀跃的安全感”才是最准确的描述。

不过，要达到内心无虞，获得“雀跃的安全感”，有难度。人类学家说，人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全感。人与动物不一样的地方，在于人类的不安全感还加入了文化因素。随着物质文明的提升，人类的不安全感不仅仅来自生存的威胁或者物质的匮乏，更多是对于自我发展的限制。当自我受限时，那种曾经体验过的不安全感，就会被激发出来。换言之，这种不安全感来自对过去的疑惑，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也来自对未来的无知，不知道将去往何方。于是感到焦虑，有一种“深宵旷野独行”的恐惧。

排解这种不安之道，或者说获得“雀跃的安全感”，最佳途径是读书。

读书，让我们知来处，也明去处，消除内心的焦虑与恐惧。正如高尔基说的，我读书越多，书籍就使我和世界越接近，生活对我也变得愈加光明和有意义。从这个角度，笔者相信那位在鄞州书城留言的读者，真的从读书中获得了“雀跃的安全感”，并由衷地钦佩。

漫画角



矫枉

王真 绘



反问



王祖和 绘

共同富裕不是“均贫富”

新知

王东京

最近学界正在讨论“三次分配”，有位相熟的企业家打电话问：“三次分配”何时启动？我明白他担心什么，他是担心“三次分配”是否会“均贫富”。

事实上，中央讲得很清楚，“三次分配”是鼓励人们自愿捐助，不是均贫富。可人们为何会有此担心呢？在我看来，是人们一直对“共同富裕”有误解。何为共同富裕？传统观点认为，共同富裕就是同等富裕，不存在收入差距。而要消除收入差距，不仅要调节收入增量，也要调节财产存量。所谓调节财产存量，无疑是“均贫富”。

其实，中国民间也流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说法。远的不说，以中国为例：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，国家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制度，可那时实际搞的是平均主义分配，吃“大锅饭”。改革开放后，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虽然人们

的收入都有提高，可也出现了“端起碗来吃肉、放下筷子骂娘”的现象。究其原因，是有人对“收入差距”不满，产生了仇富心理。

由此可见，目前社会上确实有人存在“平均主义”观念，而且根深蒂固，短期内不可能根除。也正因此，对推动共同富裕，人们往往会想到“均贫富”。而我要指出的是，共同富裕绝不是“均贫富”。那样做既不符合中央的精神，也有悖于市场经济分配原则，最终不仅不能共同富裕，反而会导致共同贫穷。

早在改革开放之初，邓小平就讲，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然后让先富带后富。当年上大学时，有位教授对邓小平的构想作过形象解释。他说好比坐公交车，若乘客不排队，一窝蜂地挤，堵死了车门谁也不去；要是分先后排队，反而容易上车。

回头看，邓小平当初的构想是正确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，已经有人先富起来了，中等收入人口超过了4亿，那么怎样让先富带后富呢？中央明确讲，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；国家宪法也规定，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。这是说，先富带后富不能“均贫富”。

有人说，政府可以鼓励富人捐助。富人愿意捐助当然好，可低收入人口多，捐助怕是杯水车薪。我的观点是，政府应支持富人投资创业。要知道，支持富人投资就是先富带后富，而且可取得长效。倘若不是这样，反过来让人们“均贫富”，效果必事与愿违。

听朋友讲过一件真事。张大爷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在城里打工多年，后来回乡办养鸡场，收入可观，小儿子一直在家种地，至今没娶上媳妇。于是张大爷让大儿子先

富带后富，拿出10万元资助弟弟做生意。结果呢，弟弟不善经营，不到半年便血本无归，而哥哥资金周转不灵，收益也大不如前。

一个家庭如此，一个国家也一样，不能简单“均贫富”。站在富人的角度，国家若不保护私人财产，富人没有安全感，自然不会放手投资；站在穷人的角度，如果允许“均贫富”，可以坐享其成，他们也不会勤劳致富。

分析至此，我最后的结论是：推动共同富裕不能“均贫富”，应重点做好三件事：第一，严格保护私人财产权，让企业家有安全感，支持他们放手投资，将财富“蛋糕”做大；第二，引导企业家合法经营，依法纳税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；第三，政府应承担起扶贫的主要职责，用财政资金扶持贫困群体发展生产、提高收入。

来源：学习时报

随思录

韩浩月

近日发布的《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》显示，28.2%的网络视频用户不按原速观看，00后尤其青睐倍速功能，使用比例达39.6%。

有观点认为，倍速观看，与当代社会普遍的“时间焦虑”一拍即合，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

“倍速时代”，长视频为用户提供了多种选择，在是否打开弹幕、是否只看某一演员的片段、是否点击购买剧中人服饰等方面，充满服务意识。观众手中的鼠标，仿佛掌握了更多主动权，只是，这种权力的存在，对于观众与长视频生产者双方来说，没有让情况变得更好，

而是显而易见地变坏。

长视频提供倍速按钮，甚至鼓励用户倍速观看，这是因为在平台看来，用户的观看，只是提供了一种数据，而数据的多寡，又决定了作品收益的高低。对于平台来说，用户只要完成了“刷刷”，就是最大的成功，至于用怎样的眼光和什么样的评判标准，不是那么重要。

好剧是让人舍不得快进的，只有差剧才会跳跃着看，也不会有损失感，而且，当用户对倍速观看形成了依赖，以后就算面对好剧，也时不时会产生要快进的冲动，这对人的深度观赏、阅读、体验能力，

是一种破坏。

美国会员订阅制的流媒体播放平台Netflix，深刻地知道用户黏性的重要性，因此在全球用户那里，留下了该平台只出产好剧的印象。最近推出的《鱿鱼游戏》，在全球有1.42亿家庭观看，而Netflix高涨的营收数字也表明，只有不被倍速的作品，才是一家视频内容提供商获得持久关注的关键。

用户采取倍速观看，是正当的权力。在电视机还是客厅中心的时候，遇到不喜欢的作品，换台就是最严厉的批评。而如今，倍速观看也具备了批评的特征，

倍速越快，用户对于该长视频的评价就越低，平台只有把倍速观看当成一种“羞辱”，才会有动力去制作吸引观众慢下来、安静去欣赏的好作品。

一些观众养成倍速观看的习惯，是平台引导的结果，更是内容低质化的结果。不要怪观众缺乏耐心，是包括长视频在内的诸多内容，没有让人产生耐心的质量与吸引力。平台想要真正赢得用户的喜爱，不妨尝试把倍速按钮取消，宁可承受被用户“换台”的风险与损失，也要拿出优质好作品，去吸引用户注意力。